

第一章 吴敬琏 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重在调控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我国确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后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当前内需不足，通缩显现的情况下，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宏观调控策略关注更甚。

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坚持并完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政策。

从宏观经济方面来说，就是两手并举的政策，一条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另一条是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法也要讲究，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太低，跑冒滴漏严重。另外企业所得税不平等，国内企业要比外资企业高。我认为内资税率应该向外资企业看齐，这样当年的税收可能下降，但加强了供给方面的活力，启动了投资，其结果是使税基加大，最后总税收还会增长。

所谓发挥企业活力的政策，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是发展非国有企业，“十五大”和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跟这个制度相联系的是改正了原来对私营企业的说法，明确指出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原则贯彻得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外资和民间投资都十分活跃，你可以看到那里生气勃勃，而且效率很高。这样好的地区占全国的比例不到 1/4，但是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公认 21 世纪最大的加工基地是中国，靠的就是这 1/4 的区域。（2002 年）

吴敬琏 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正在减弱

仅仅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回升，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真正越过了“拐点”。财政投资对整个需求的拉动只是起一种短期调节作用，它只能刹住经济下滑的势头，但很难支持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而从长期来看，财政投资还对民间投资有抑制作用。因为财政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向百姓借的钱唯一来源就是收税，这就会加重税收的负担，而加重税赋无疑会拉长投资者的回报周期，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影响。此外，我国实行 3 年的财政拉动政策以后，好的、效益高的项目将越来越少，而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总是不如民间投资效益高。因此，用财政投资刹住经济下滑的势头，可能在头几年效果比较显著，但到后来作用会逐渐减弱。（2001 年）

吴敬琏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逐步淡出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稳定的回升通道。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有必要坚持两手抓，但必须加大供给政策的力度，激活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

企业活力提高的同时，减弱需求政策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逐步淡出。从短期来看，财政投资的积极的效应大于消极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消极的效应会增长。

20 世纪遗留了六大难题，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加以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大量下岗职工需要分流；二是农村巨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农民贫困状况未有根本改变；三是部分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四是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广大地区有待开发；五是行政机关对企业微观干预仍广泛存在；六是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有较大距离。21 世纪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一个是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机遇更是挑战，不面对是不行的；一个是网络经济的冲击，网络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交往方式，更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冲击也不可低估。（2001 年）

吴敬琏 冷静看待 “一枝独秀”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原因，一个因素是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这是其他的国家所很难比拟的；第二是我们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发挥了国内市场的潜力。我们这个“一枝独秀”的状况能不能长期保持，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分析。一方面，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确和有效。另一方面，经济体本身要有活力，也就是主要是企业的活力有提高。如果这两个方面都不是那么一片大好，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就需要研究它的优势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缺点能不能得到克服。如果说优势不能保持，缺点还发展起来了，当然“一枝独秀”就“秀”不了很久了。

我国的市场体系，政府规制和法制环境还很不健全。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应对它，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改善，就是最大的机遇，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就可以发展了，而是向我们提

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正确地响应了这个挑战，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这就是最大的机遇。（2001年）

吴敬琏 财政启动的主导作用将被取代

财政启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将被取代，1999年下半年财政启动将不再唱主角，把大规模投资作为1999年下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要启动中国的住房市场，要设法增加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结构不合理和贫富过于悬殊的现象影响到消费市场走向；要让货币供应有所增加，不能光靠政府投资，还要靠民间投资和消费；要鼓励银行向消费和民营企业投资信贷。

吴敬琏重申多次说过的一个观点，即光用凯恩斯主义增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还要用供应学派的政策，大力放手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壮大会改善供给，引导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1999年）

吴敬琏 经济出现转机更要加紧 推进改革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走势出现了市场由冷转暖、经济增长速度止跌回升的良性变化，经济学界对此无太大的分歧。不同的意见集中在对好转原因和好转程度的分析上。有的认为经济走势只出现拐点或转机，没有出现“转折”甚至只是随机波动，无实质性改善。

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看漏了1998年以来反衰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扭转经济下滑的走势，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并取得成效的，不是单纯扩大需求的“单手政策”，而是一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另一手抓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两手政策”。今年上半年经济状况好转，正是这两方面的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需求方面的政策是一种长于起“启动”

作用的短期政策，供给方面的政策则是一种能为效率提高和持续增长打好基础的长期政策。用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快地产生启动作用，但是，由于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而且由于财政赤字终究要用增加税收来偿还，它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财政投资的效果堪虞，因此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供应方面的政策的缺点是见效比较慢，但是由于它提高了企业的活力，乃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本道路。为了寻求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当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并在经济形势发生转变的时刻洞察先机，对“两手”的力度配比作出调整。在停滞和衰退的早期阶段，当经济下行的势头方兴未艾之时，在上述“两手”中应以“第一手政策”为主，以便及时刹住经济下滑和社会不良预期形成的势头，同时着手实施“第二政策”，培育支持经济长期繁荣的深层基础。而在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被制止的情况下，则必须总结执行“第二手政策”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实施力度。

我以为，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政策转换点上。如果处理得好，进一步把“供给方面”的活力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不但能使好转的势头持续下去，还能为迎接进入 WTO 后激烈竞争的挑战和为国民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政府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

第一，继续贯彻十五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全面清理制度法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取消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它们获得外贸经营权的“入门坎”。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协同社会力量，大力改善对企业的公共服务。

第二，在总结重点产业改组和重点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国家产权行使方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老大难”问题，建立发挥大型企业竞争活力的制度基础。

第三，在近期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这方面的工作国务院已经作了部署，现在应力争如期实现。基金制社会保障系统的

建立将对国有经济重组和资本市场形成等发挥多方面效应。

第四，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价格、投资等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管制和微观干预，逐步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监管框架。

第五，加快国有银行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在规范的基础上发挥证券市场，改善目前企业债有烦言的融资环境，支持民间创业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第六，利用财政比较宽松的时机，实现 1994 年财税改革尚未完成任务，例如，改变按照“隶属关系”征交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和向流通领域的扩展，以便消除跨地区投资的障碍和建立中外企业和不同行业间平等竞争的环境。

最后，政府最为重要的责任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
(2000 年)

厉以宁 经济出现重要转折不 等于已经全面好转

应当承认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折，但这并不等于经济已经全面好转。首先，国有企业的效益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只有转换运行机制，才能走出困境，但是目前，运行机制并未转换；其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三，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也比较慢。

一方面当前我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迹象，没有出现商品短缺，积压库存还相当多；另一方面，只有增发国债，才能加大投资力度，还本付息的可能性才越大，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变，否则将前功尽弃。

要准确把握加入 WTO 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能引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任危机，所以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服务质量，增强老百姓的信任度。这是当前非常迫切的问题。

开发西部一定要抓住经济利益这个核心，给西部优惠政策，要创造条件，让投资者在西部能够做东部做不了的事，还要抓住重点。重点发展西部现有的经济中心，以此来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

就业问题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在社区服务方面就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所以，一定要打通广泛的就业渠道。应该充分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当前的关键问题。农村市场不启动，就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如何启动农村市场？不能靠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办法，应该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2001年）

厉以宁 当前最大危险是失业

当前无疑要抑制通货膨胀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势头，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最可怕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人口的增加。

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不可能没有一定的通胀。在现阶段，只要政府运用四个“法宝”银行保值储蓄，按生活指数调整工资、退休金，利用行政手段制止乱涨价，万不得已时实行限价供应，通货膨胀就不会严重恶化。

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下，人们只要有工作，有收入，起码就可能维持生活，但如果失去工作，人们必然会焦虑不安，甚至会有极端行为。如果国有企业长期发不出工资，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又不肯返回穷乡僻壤，社会将出现“绝望阶层”，这必然会成为大乱的根源。

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制时，应置安排就业于优先，兼顾物价的基本稳定。（1994年）

戴园晨 双手反对公务员再加薪

对于为国家公务员再次加薪的提高工资以刺激消费需求的政府建议，我举双手反对。

刺激国内的消费，有很多途径，在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就业不充分以及农村收入水平低下，不必要非通过给公务员加薪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即使第三次提高工资，拉动的消费需求也不会很大。

第一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一个手拥护，一个手不拥护，2002年还要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反对。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如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1000亿。

农民收入低表现为我们在所有制分配上就是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农村的义务教育不是由政府承担而是农民自己负担，农村大量的教育是靠摊派来维持，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把农村义务教育变成一个公办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成为我们决策层思路范围之内。（2002年）

林毅夫 实施发展战略切勿盲目赶超

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应定位在自己的比较优势上，适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就搞好，不适合的则不要劳民伤财。要考虑国情，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分阶段确定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如果在实施发展战略上不切实际，盲目赶超，那么价格就会受到扭曲。因为赶超，政府势必会将大部分财力按计划配置资源，这样在价格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别，从而导致腐败。同时企业也只能通过获得政府补贴才能赢利，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包袱就会越背越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例，作为后发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应分阶段进行。首先可以大量引进技术，但不需要在最边缘最尖端的技术上跟发达国家比，因为越是技术前沿的东西，所需要的资金成本、人工成本、买专利成本以及试制成本就越多，硬拼是很难拼得过的。打个比喻，就好比让下士与上士赛跑，你怎么跑得过？比如信息产业，最尖端的地方我们就不应该去跟人家竞争，因为那个地方资本投入

太大，花了很大气力，最后成功的概率还可能比他低。

发展高科技要选好区段，大力发展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但也要致力于在少数几个有条件的重点高技术领域突破。因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积累快，产业、技术结构就会得到快速提升，也才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001年）

刘国光 积极财政政策再实行两年是可行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多长时间，要看财政承受能力和经济增长机制。目前，我们还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离警戒线还有距离，2001年及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可行的。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同时，也要警惕通货膨胀。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越过拐点后增长率将保持在7%—8%的平台上。

去年我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说明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功不可没。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实行多久，是否在“十五”期间一直实行下去，是当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2000年，社会投资虽然已经有所启动，但是还不太强劲，目前我们还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离警戒线还有距离，银行存差也还很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看来，积极财政政策再实行两年还是可以支持的，2001年及2002年可以继续实行。国债投资在拉动社会投资增长中取得了成效，但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投资在拉动社会投资增长中“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仍需探讨。过去3年的作法是要求地方筹措资金与中央财政投资配套，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有相当部分是以财政做担保的银行贷款。对于收益高的项目，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但有些项目收益很低或基本没有收益，将来还贷就会有问题，造成地方财政危机或产生坏账，增加银行的金融风险。我看今后还要在方式上做些调整，发挥财政的引致使用，吸引民间投资或外资介入基础设施建设。

就整个“十五”期间而言，我们不应期待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

政策。依靠国内需求是一种长期政策，而赤字政策是一项短期政策，它不能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效率也较差，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的承受能力总是有限度的。

既然赤字政策不能长期使用，为了配合启动经济，我们现在就应在使用国债投资手段的同时，把非国债手段逐步使用起来、强化起来，进一步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居民消费，使其形成停发国债后仍能扩张下去的势头，并最终形成消费与投资自主扩张的机制。

(2001年)

刘国光 宏观调控应实行稳定性政策

从现在起，到进入下一个周期，宏观调控在总体的把握上应该采取一种稳定性政策，即通过宏观调控，通过松紧政策的变换与搭配，促使经济波动平滑化，而不能人为地去加大波动的幅度。

关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可以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

其一，如果不去追问物价上涨率与经济增长率这两者的挂钩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存在着含糊不清的问题，而仅从近几年来我国的物价上涨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首先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率降低到经济增长率以下，“我认为，这是可以暂时接受的”。

其二，如果把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作为物价上涨可以被接受的标准，作为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的标准，刘国光表示“这个提法是欠妥当的”。

其三，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物价上涨率挂钩的，不是现实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而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

其四，在考虑控制物价上涨率的时候，还要为合理的、正常的、适度的价格调整和改革留出一定的余地。这个余地可以构成控制物

价上涨率的下限。而其上限则是银行利率。

其五，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只能作为我们近期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的过渡性目标，而不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经常性目标。
(1996 年)

王东京 扩大内需有三张药方可用

药方一 财政贴息刺激民间投资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对拉动内需、缓解生产过剩，的确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如何进一步拉动内需，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文章：

第一，在政府投资之外，刺激民间投资。单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单打独斗，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的经济总量太大，用 2000 亿投资基础设施，需求不能完全拉动起来。现在老百姓有 7 万多个亿存款，财政拿出 1000 亿贴息，至少可以带动 1 万亿的社会投资。

第二，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政府主要投资公共品，其他非公共品，可以调动民间资本去投资。政府直接投资项目，通常不是资金被挪用，就是造成大量三边工程（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何以如此？说到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药方二 以减税拉动内需

扩大内需，政府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政府买啊；第二是财政贴息，鼓励民间投资；第三就是减税，把税率降下来，企业盈利就会增加。以上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作用有限，治标不治本；第二个办法，对拉动投资会有积极效果，但力度仍不够，只有配合上第三个办法，才能如虎添翼，真正把投资拉动起来。

不过，中国目前该不该通过减税，大家分歧很大。但我感到至少有几个情节，值得人们重视：一是我们是否应该为国有企业减负？二是我们是否应该把重复建设的问题，交给行政法规或有关法律去控制？三是我们可否考虑，调整消费税目，减征或停征某些

消费税？

药方三 用增收带动消费

市场经济总会有内需不足，所以扩大内需，绝不是三五年、七八年的事，既是如此，市场经济要出现过剩，我们的消费观念就得变一变，不变的话，问题会很麻烦。该消费时就得消费。

中国人要提高收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过去我们不敢涨工资，是因为商品短缺，担心抢购，哄抬物价。现在生产过剩了，大量商品积压在那里，物价持续走低，我们欢迎抢购，欢迎哄抬物价。物价涨一点，只要不超过 7%，绝无风险。而且，提高收入，留住人才，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胜负。

结 论

扩大内需最根本的当然是发展经济。但近期看，提高中国人的收入，是上选之策。提高收入，不仅可以刺激消费，解救眼前之急，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争取主动。但如果老百姓没钱，需求只是水中之月，我们手里握着的筹码，不就少了很多分量吗？所以提高收入，是一个战略大计。政府今后少搞点项目，坚决刹住重复建设，杜绝形式主义，把省下的钱为老百姓增加收入，特别是为农民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岂不更好？所以能不能提高收入，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我们花钱的思路。（2002 年）

胡鞍钢 不宜用减税来刺激经济

目前中国采用减税措施并不能达到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目的，而应实行旨在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税收政策。

中国税收大幅度增长不是“增”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过去几年，中国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其增速大大超过了 GDP 的增速，这并非增税政策的结果，而是加强税收征管后提高了实际税率，又取消了乱七八糟的各种减免税，把本来该征的税收征上来。

中国除新开征利息税之外，没有开征其他新税种，也没有大幅

度提高税率，是在税制、税种、税率三个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的税收高增长，这种高增长是正常和健康的，因而无需减税。

中国已加入 WTO，必须实行“公平税赋一视同仁”的税收制度。政府目前要使税收制度更加中性化、简明化，并提高征收效率，而不一定要在税收减免上作文章，但可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鼓励企业投资。

中国城镇居民实际个人所得税税率十分低下，差不多为世界最低，个人所得税不仅没有征够，而且还相当不公平，政府应该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2002年）

戴园晨 没有消费推动的经济是短命的

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造成了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过热，如果不注重培育新的消费支撑点来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我国的经济将发展将是短命的。按照一般经济规律，投资到一定时候，就应转化为消费，但目前新的消费热点根本没有形成，从而造成病态的经济运行现状。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以改变目前经济发展靠投资拉动的不利局面，使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就必须将目前的福利型工资和消费改革为货币化的工资和消费。为此，要加快福利型工资向货币型工资的转化步伐。其根本出路在于住房改革，并以此来拓宽消费领域。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盲点。（1994年）

赵 晓 谨防局部性结构性财政危机

中国总体上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局部的、地区性的财政危机正在显现。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财政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由于税制改革不到位，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乡这一层次的财政的确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按理说，事权财权相结合，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以及管理权限，这是建立完善、规范、责权明晰的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财政体制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事权与财权不清的缺陷，分税制改革的一大结果，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幅度上缴中央后，职能、职责范围几乎丝毫未减，使其财力与事权及支出范围极不相称。中央政府一方面大包大揽，自己请客时常让下面出钱，另一方面该管的事又没管好，像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就乏善可陈，致使在中央出现“结构性财政剩余”的同时，地方“结构性赤字”达致极点。尤其是中国的基层债务这一块，可以说是问题成堆。据估计，目前全国仅乡镇这一层的债务窟窿已高达 2000 亿元，这还不包括县级政府和村级政府的债务。

中国居住在县、乡、村一级的人口约 10 亿多，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居民和农民人均负债约数百元，由于 13 亿人口中有 9 亿是农民，因此基层债务的负担更主要的是农民的负担。由此看来，农民负担重其实是财政危机的重要反映。我们在总体上得出中国不会出现财政危机的结论时，不能够对基层昭然若揭的财政危机视而不见。（2000 年）

丁宁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未过去

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新阶段的说法值得商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没有过去。“稳定增长”指的是二战后成熟工业国家的经济特征，不可能为刚刚完成初级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虽然我国经济经过 20 年的调整，但依然处于典型的经济“起飞”阶段。经济结构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必要的法规、制度也处于建立、完善的过程之中。由于资源从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经济应当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是缓解结构剧烈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必要前提。

根据人口模型推算，中国确实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但离人口

深度老龄化阶段至少还应有 20 年的时间。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抚养率较低、劳动力增长较快的阶段。因此应该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尽可能在人口深度老龄化到来之前进入那种特殊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

从构成生产函数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看，中国目前依然具备高速增长的潜力。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 30% 以上的水平，国际资本流入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势。如果中国城市化率能从目前的 20% 提高到 2030 年 50% 左右的水平，每年仍有约 2000 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加上国有企业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01 年）

刘光溪 入世将使中国由改革促 开放转向开放促改革

入世是中国融入以市场经济和国际规范为基础的多边经济贸易体系的一项基本国策。按照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利益和速度，并结合 WTO 协议和各成员的要求所形成的条件而及早入世，赢得了巩固扩大民族根本利益的机遇和条件。

入世将给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 5 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政府管理职能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二是法律体系将走向公开透明，逐步与国际法规相靠拢，相适应；三是经济环境将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四是企业制度将由政企不分走向企业主体，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五是行业协会将替代大量政府管理职能，发挥真正的中介服务作用，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和公共成本。

体制改革发生 5 大变化的同时，入世也将使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 5 大转折：一是由过去有限领域、有限范围的对外开放转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二是由试点、试验为特征的梯度开放战略转向政策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整体推进开放战略；三是由以计

划、行政命令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对外开放转向以市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市场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四是由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和按自己时间表的对外开放转向重视国际规范和与 WTO 各成员共同协商的对外开放；五是由过去 20 年改革推动开放走向开放促改革的重大转折。(2001 年)

宋国青 中国将面临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

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将是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这个论断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经济增长率相对会比较低，当然也不排除新经济、新技术、国际经济交流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些经济推动因素使之改观的可能性。第二，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第三，国有部门的负债、保险基金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都会有比较突出的增长。(2001 年)

刘遵义扩大内需须先破除地方保护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时说，扩大内需须首先清除省际间障碍、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他提出具体建议：中国应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商业税收法庭，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处理全国各地发生的商业和税收方面的争端。

他说，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增长。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所能够产生的内需，要远远大于一系列小的、分裂的市场产生的内需的组合。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陆型经济体，国际贸易对它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取决于内部需求的增长。

他指出，如果各个省的劳动力和资本可以根据各地的优势进行有效分配，经济的效率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工业化的扩张趋势也会慢慢延伸到中国内地的一些省分，这就需要我们清除一系列的障

碍，推动省际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统一的大市场，可以使中国在设计国际型的技术标准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将降低地区间收入的不平衡状态。

如果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商业税收法庭，就可以对全国各地的案件形成约束力。比如你上海有一件案子，上海法庭来审判，你可能会输。如果由统一的全国商业税收法庭来审理，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公平一点。（2001年）

钟 伟 中国经济新“三驾 马车”隐现

世界经济步入下降周期对我有显著影响。原来美国商务部预期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将增长 2%，而公布的数字却只有出乎意料的 1.3%，而公众的预期更悲观，以为实际上只增长了 0.5%而已。美联储的连续 6 次降息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显示出美联储没有看到美国经济的底部在何处，降息反而恶化了市场预期；二是显示出美国经济“长腿”变短容易（新经济投资疲弱、市场萎缩挤出泡沫容易），但“短腿”变长艰难（“空心化”的传统产业难以重新夯实）。结论是：美国经济必然将步入“U”型中期调整。而欧盟失业情况严峻，日本则仍为“景气优先”还是“结构优先”在吵闹不休，全球经济显然在突然失速。

在内需回升中，除政府一只手增加税收和举债，另一只手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扶持国企的努力之外，到底有哪些因素促成了我国经济内部需求的“自主性”回升，在抵御世界经济失速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相对平稳的增长？一是外资流入的戏剧性增长；二是房地产投资快速回升；三是企业和居民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依旧。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01 年度亚洲发展展望的预测，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仍然是经济增长最为强劲和平稳的国家。在经历了 1997 年利用外资徘徊不前的局面后，国际资本重新开始青睐中国，1-5 月